



随着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公众对西夏陵及西夏学的关注度提升，希望深入了解西夏王朝的兴衰轨迹以及西夏与各民族的互动关系。

元朝修撰前朝史书时，仅编修了宋、辽、金三史，独未修西夏史，造成西夏历史资料的严重缺失，长期以来西夏研究进展迟缓。近三四十年来，西夏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推动力一是以西夏陵为代表的西夏文物的发现和系统研究，二是以黑水城（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出土的大量西夏文献的整理、刊布、译释与研究。在这些文物与文献中，保存着诸多反映西夏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典型资料。

过去的研究表明，西夏陵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的陵寝制度与陵园结构借鉴中原地区的传统；西夏陵出土的文物包括石雕、陶瓷、铸造、纺织等门类，多属手工业制品，其工艺也与中原地区一脉相承。西夏陵园3个陵的碑亭遗址陆续出土了9座人像石碑座，近似正方体，有男性、女性之别，皆以夸张手法表现负重者的神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177号陪葬墓出土有硕大的鎏金铜牛，长1.2米，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反映出西夏成熟的铸造工艺。西夏陵园出土的大批建筑构件，反映出西夏

西夏文物文献中的民族交融图景

史金波

建筑的工艺水平，其技艺足可与中原建筑构件相媲美。

此外，西夏陵中的诸多细节更值得关注，对我们理解西夏社会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西夏陵很多碑亭出土的大量西夏文、汉文残碑证实了在西夏最高等级的建筑中已形成两种文字并用的制度。尽管碑文已残碎，但依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有效地补充了历史文献的不足。西夏皇室为党项族，却在皇帝碑亭中竖立汉文碑，表明党项族和汉族在西夏都是主要民族，两种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印证，用碑文的形式镌刻历史印记。

一些碑文的撰述形式与专用词语的运用，彰显出西夏当时的文化表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字数较多的汉文残碑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流行的语体样式。如，陪葬墓中墓主人皆为王公大臣，在汉文碑文中一般都尊称“公”，这是中国传统“为尊者讳”的碑文书写惯例，而在西夏文碑文中直接称为“尊者”，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又形成了独特的记述方式。

西夏陵6号陵的汉文残碑中出现了“軒轅”一词。结合西夏文文献《圣立义海》《孙子兵法三注》中对黄帝、轩辕的记载，进一步证实西夏对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的崇敬，这一理念不仅载于文献，更在西夏陵这一高等级建筑的碑文中留下明确印记。在7号陵出土的西夏文残碑中有“夫子”一词，在这里特指孔子。联系到西夏曾将《论语》翻译为西夏文，并将孔子封为文宣帝，不难看出，西夏陵碑上出现儒学代表孔子的称谓，正是西夏对中原儒学深度接纳与传承的直接体现。

西夏陵出土的残碑文中，还保存了大量

西夏的职官名称，部分可以与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相互印证，部分则是汉文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献所未见，凸显其独特史料价值。如，西夏文残碑文中有“上柱国”的称谓，汉文碑文有“柱国”的称谓，证实西夏设有勋官；西夏文和汉文残碑中都有“金紫光禄大夫”，表明西夏存在阶官制度。这些记载既补充了西夏职官制度的重要内容，也彰显出西夏不仅在职事官体系上承袭中原传统，在勋官、阶官设置上同样延续了中原王朝体制。

此外，6号陵出土的汉文残碑中有北宋太宗“淳化”年号（990年—994年），应是追述前代历史时所用，印证西夏建国前对宋朝正朔的遵从。更值得关注的是，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和汉文残碑中，多处记载了多个民族名称，足见西夏时期各民族往来之密切。

20世纪初初期，黑水城出土文献与文物遭俄国、英国所谓“探险队”劫掠。20世纪90年代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合作，将珍藏于俄罗斯的大量西夏文、汉文资料进行整理，并在中国陆续出版，为推动西夏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词语集，其作者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不学番言则岂合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体现了对民族间加强文化交流的重视。此外，反映西夏社会的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据其颁律表可知当时还存在汉文本，可见制度层面的多语言应用。出土文献中，中原的儒学著作《论语》《孟子》《孝经》，兵书《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将苑》，类书《类林》等均被译为西

夏文；同时，西夏还编纂了不少仿中原地区的通俗类著作，展现了对中原文化的系统吸纳。在宗教领域，相关史料能清晰呈现出西夏佛教发展中的多民族交流轨迹。

西夏文文献中还有大量反映社会生活的文书，多以草书写成。其中不乏各民族和谐共处、密切交流的内容。西夏户籍中，户主既有党项族，也有汉族；西夏文契约中，不仅有党项族、汉族，还有契丹族以及回鹘、柔然的后裔；部分契约中，立契者与立契契者为夫妻关系，而且是跨民族婚姻。

西夏时期的文物与文献证明：西夏文明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各民族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各民族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凝聚共识，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图①：西夏陵6号陵出土的刻有“軒轅”一词的汉文残碑。
图②：西夏陵出土的红陶套兽。
以上图片均为史金波提供



▲红山文化的标志性文物玉猪龙。 上海博物馆供图



管窥红山文明 贾笑冰

上海博物馆的“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展”在暑期备受关注。展览以红山文化最具标志性文化符号——玉龙为主线，汇集了辽宁、内蒙古、河北三省区的考古新发现，搭建起红山文化的形成（龙兴辽河）、发展（龙行红山）和影响（龙行九州）的完整图景，是红山文化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红山文化形成于距今6500年前后，延续发展至距今4800年前后，遗址广泛分布在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and 河北省北部区域，分布范围近30万平方公里。展览意在通过典型文物和重要考古发现诠释红山文化繁荣发展的主要脉络。

连续性与创新性是红山文化发展的特征。虽然平底筒形罐是红山文化最典型的陶器，但玉器的发展和彩陶的出现显示了红山文化创新的活力。玉器的种类和数量不断丰富，最终发展成更具社会功能的礼器；彩陶是红山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物质载体，是红山文化开放创新的体现。

以祭祀礼仪活动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是古国文明形成的制度基础。迟至在红山文化中期偏晚阶段开始，公共的祭祀礼仪活动中心开始营建和使用，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就是其中等级规模最高的祭祀礼仪活动中心。考古发现的有关祭祀活动遗迹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已初步形成了祭祀天、地和祖先神的体系；堆积特征不同的祭祀坑则表明可能已经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祭祀对象的分类体系。这一脉络通过数字化展陈得到加强。

高等级成员之间在使用玉器的质地、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则显示与文献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相似的等级秩序已经出现。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辽宁阜新新胡头沟遗址共同勾勒出一个半径约150公里的统一社会的简单样貌，新发现的内蒙古敖汉元宝山遗址的结构布局、随葬品规范与此相似，是红山文化等级秩序中的重要一环，为红山文化广域空间内礼制规范的存在增加了新的证据。

距今5000年前后，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祭祀礼仪中心的繁荣不再。是过于关注祭祀活动而带来的衰败，还是面临自然社会环境变化做出的主动选择？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的新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线索。郑家沟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考古学家苏秉琦“古文化上的辽西区”的范围，相关证据表明郑家沟遗址的人群可能是红山文化末期向南发展的一支。将郑家沟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实到展览中，完善了红山文化末期逐渐汇归中原、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脉络，为“重建中国史前史”创造了新契机。

此次展览集中展示的玉龙是红山文化中造型相对复杂、分布范围广且较为规范的一类器物，也是红山文化最为人熟知的文化符号。但从考古发掘出土情况看，玉龙并非红山文化中等级最高的玉器。从造型上看，玉龙属于复合型的仿生类玉器，是红山文化复杂玉礼制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民众接纳和认同红山社会等级秩序的物质表征。

红山文化的众多考古发现，为我们从制度和精神领域探讨红山文化乃至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展”为观众从文明的视角重新理解红山文化提供了可能。

提升水下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水平

孙 键



海上丝绸之路延绵2000多年，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这条航线最后一直延伸到东非海岸，全长1.4万公里，途经多个国家和地区，可称得上是古代最长的远洋航线之一，唐宋时期更是出现了“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盛况。而在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的近400年里，中国商船靠着先进的罗盘导航，乘风破浪，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波斯湾的尽头与非洲东部。借助季风，春夏之际，一队队商船，满载着来自异域的物产，从印度洋甚至更远的地方驶来；秋冬之际，商船又将畅销世界的中国瓷器、铁器、茶叶等运往西方。

我国有着辽阔的海域面积、绵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其中蕴含着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水下文化遗产。这些水下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大量珍贵的古代信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水下考古专业队伍成立，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水下考古工作已经由单一的水下考古向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过渡。

每一艘远航却不幸沉没的古代船只，都相当于陆地考古的一个遗址，是那个时代高度浓缩的标本与“时间胶囊”。通过捕捉信息，考古工作者可以再现真

本报邮箱：ysjb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王 瑾

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

张济夏



▲张济夏在比赛中修复瓷碗的前后对比图。 国家文物局供图

随着第二届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闭幕式的结束，各项赛事的名次尘埃落定。站在领奖台上，我回望着从前的自己，10余年从业生涯及保护修复过的近千件文物历历在目，一切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比赛分为理论和实操两部分。理论考试要求选手在90分钟内作答160道题，内容涵盖陶瓷器制作工艺、陶瓷历史发展演变、分析检测、陶瓷文物保护技术手段、陶瓷文物修复流程和可移动文物方案档案编制相关标准等，需要选手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

实可信的历史细节。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较晚，但依然是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遵循“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方针，我国开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与保护项目，在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同时，还通过积极鼓励公众参与、主动回馈社会的方式，拓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外延和内涵。

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文化，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寻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因此，沿海地区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更需要得到加强。摸清家底，全面普查水下文化遗产资源状况势在必行。这既包括历代沉船、港口遗址与航海遗迹、海滨聚落与建筑、海防史迹与海塘工程等物质文化遗产，也涵盖传统造船与航海技术、海洋文学与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建设水下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编制遗产项目与资源图谱，科学评估水下文化遗产资源价值，并根据重要性、脆弱性和保护需求，制定差异化保护措施。同时，还可以通过推进水下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海洋文化公园建设等举措，提升水下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水平，形成水下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格局。

今天，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水下考古学术研究发展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格局，正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贡献，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与方案。

（作者单位：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一线工作经验。而实操部分时间分为两天共15个小时，要求选手在实施保护修复工作流程的同时，完成保护修复方案和档案的编写。两部分考察的内容不同，实操环节更像“抽盲盒”，选手们不知道自己会接到何种类型的陶瓷文物，也不知文物的破损情况，只能靠基本功扎实不扎实。

我修复的器物是一件“宋代影青釉划花瓷碗”。口沿缺损近50%，整体缺损40%，胎体极薄，色彩丰富。在湖北省博物馆，我已独立修复很多重量级陶瓷文物，但这件文物补缺及作色难度还是很高的。更棘手的是，器物在烧造过程中混入污染物，釉面色块斑驳，修复时需精准匹配每一处色彩。

谋定而后动。在对器物的病害情况进行了基本的“望闻问切”后，秉承最小干预原则，我制定了以“清洗—补缺—修整—作色—补绘—调光”为主的技术思路，陶瓷文物修复的基本功都会被考核到。

经过15个小时紧张的保护修复实施，我终于在最后5分钟内完成了它的保护修复工作，达到了整体结构稳定、外观完整、真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既定目标，提高了其展陈效果和利用价值。

湖北文博界的陶瓷文物修复能力一直很有口碑，曾多次为全国重点文博单位提供技术支持。我的老师说过，再有天赋的人，也要练上近10年才能真正成为文物修复师。我现在也带出了徒弟，大家一起不断提升文物修复的理念和技法。虽然高科技的手段运用自如，但“古法”不会忘，爱文物、保护文物的初心不会变。

文物都是过往历史的载体，而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

（作者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仇金标

位于江苏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里，有一块乍看平平无奇的石碑，每年吸引的参观者不计其数。细看，石碑高约2米，材质为汉白玉，碑额上书“宋公纪功碑”。570字的碑文，道出一段感人故事：“长堤南起华成北迄淮河，约八十华里，底宽二十一公尺，顶宽三公尺五寸……”“宋公”是谁？这段“约八十华里”的大堤是怎样建起来的？

让我们先从革命老区盐城的地理位置说起。盐城东临黄海，历史上，盐城沿海曾饱受海啸、海潮侵袭之苦。1939年8月，盐城北部沿海发生了一场特大海啸，海潮所过之处，茅屋被掀翻，村庄被荡平，良田被吞没，被淹死者1.3万多人……就在此时，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站了出来，“挡”在滔天海潮前。

碑文上的“宋公”名为宋乃德，山西省沁源县人，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随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东进，开辟盐阜抗日根据地，任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为了使民众免遭海潮之苦，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将修筑捍海大堤列为头等民生工程，宋乃德负责推进。1941年5月15日，修堤工程开工，新四军三师官兵与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党员干部利用战争间隙，带领当地上万民众争分夺秒修筑海堤。

修堤过程异常艰辛。在堵塞最大的堤口五丈河时，突逢大雨，监工员和乡保长奋不顾身跳入水内，在急流中阻挡水力冲击，其余工人迅速挖泥堵塞，经过11个小时不停的工作，终于将堤口合龙。就在大堤即将竣工时，敌人加紧了破坏行动，制造“尖头洋惨案”，先后暗杀监工员陈景石、修堤副指挥陈振东等多名党员。但任何困难都无法吓退共产党人，海堤工程最终于7月31日全线竣工。

这条绵延近45公里的捍海大堤，位于盐城市滨海县境内，堤高3米，底宽19米，蔚为壮观。大堤竣工的第二天，一场特大海啸突然来袭，大堤在一次次冲击中岿然不动，守护了一方家园。沿海居民效仿“范公堤”的命名方式，将大堤命名为“宋公堤”，并刻立“宋公纪功碑”，以表达爱戴之情。

修建宋公堤是新四军到盐阜地区后为人民办的大实事，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阻挡海潮的作用。2021年，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早期水利建设的典范，宋公堤入选首批省级水利遗产名录；2023年，被水利部列入“人民治水·百年功绩”治水工程项目。

宋公堤是伟大的见证。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在反“扫荡”极端困难的情势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心连心、牢牢依靠人民群众精诚协作，完成了这一“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对扩大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从此再无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有宋公堤这样的“民心工程”造福于民，新四军得到人民由衷的热爱与拥护。

2019年，新四军纪念馆提升改造工程启动。由盐城市滨海县人民政府捐赠的“宋公碑”，被列为重要内容之一。纪念馆将其用钢化玻璃罩上加以保护（右图，新四军纪念馆供图），并创新采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和复合3D打印技术，成功制作宋公碑的仿制件。2024年，在“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新四军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巡回展”中，这件宋公碑的3D打印仿制件正式展出。巡展历时3个月，接待观众近8万人次。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参观者们不仅能从宋公碑的故事中感受到浓浓的鱼水深情，更能从中汲取到奋进的力量。

（作者为新四军纪念馆馆长，本报记者姚雪青整理）

在伦敦遇见中国空竹

赵嘉铭

4年前，我离开北京来伦敦留学。在满满的行李箱里，妈妈给我放进了一个空竹。

第一次听到空竹的声音，是在小学第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那是条曲折的胡同，我左手牵着爷爷，右手牵着奶奶，兴高采烈地讲着学校的新鲜事儿。走着，说着，笑着，突然在胡同拐弯处，传来一阵声音，如风如哨，时大时小，由远及近。我挣脱爷爷、奶奶的手跑了过去，原来是一位老爷爷拉着长长的绳子，抖动着飞旋的小车轮样的东西。老爷爷告诉我，这就是空竹，主要在北京和天津地区流行，南方也有，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年龄太小，我当时对这些概念和物理原理不感兴趣，只是很好奇，老爷爷能把一个东西抛出声音来，而且不落地，真厉害！

小学三年级时，学校里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非遗兴趣班，我特意选了空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练起来可没那么简单。为了能拿小红花，我有时练得第二天胳膊都抬不起来。期末汇报演出时，奶奶却没来，生病的她没能看到我的表演。

后来，我带着空竹来到伦敦，将童年的快乐与不舍的亲情带在了身边。小区里，有来自中东、北美、南亚等不同地方的邻居，大家周末总是聚在小广场上，看着孩子们欢快地玩耍。3年前，他们发现，每个周末总会有位中国的“竹竹”哥哥教他们一起玩，除了空竹，我还教他们打快板。这些用竹子制作的玩具和乐器，让大家认识了中国的文化。

一天，我路过考文特花园街头，远远看到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个红色的轮子时不时地跃出人群。难道是空竹？我迫不及待地跑过去，仿佛“他乡遇故知”。扒开人群，原来真的是空竹！而且，表演者还不是华侨华人，他的水平不输我的老师，带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声。看着周围那一张张意犹未尽的天真笑脸，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在北京小胡同里第一次邂逅空竹的自己。

（作者为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生）

